

解放战争初期门头沟矿区 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张 启 林

京西门头沟地区的采煤业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这里就开始出现。一八八三年，官僚资本家段益三在圈门开办了北京地区第一家近代企业——通兴煤矿公司。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资本家、私人资本家接踵而来，开办了中英门头沟煤矿、中兴矿、宏顺和四维等近代化矿井。近代化矿井的发展，使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流民成为煤矿工人。门头沟成为北京地区工人阶级的重要聚集地。

煤矿工人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门头沟的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罢工运动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震动了京西，影响了北平，使门头沟矿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进入新的高潮。

一、抗战后门头沟矿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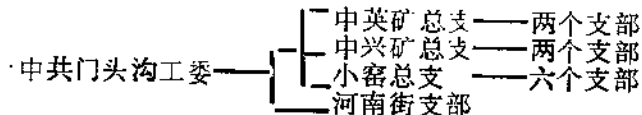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侵吞胜利果实，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第九路军分三路（南山、北山、中路即河滩）进占了门头沟，对该地区实行了反动统治，广大矿工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成立北平工人工作委员会。北平工委又专门设立了门头沟矿区工人工作委员会，以进一步领导门头沟的矿工运动。门头沟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员：书记张宏舜、副书记张忠义，组织委员李长顺（一九四六年七月后接任书记），宣传委员于文新。从此，门头沟矿区的工人运动在门头沟工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 党组织的建设、发展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发动工人运动必须抓好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中共门头沟工委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矿区积极培养、发展了大批优秀工人入党，使各个大矿和部分小窑很快建立了党组织，党在门头沟矿区的力量迅速壮大和发展起来。

截止到一九四六年春，门头沟矿区已形成一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的网络。



另外，在宏顺矿建立了党小组，党员总数已接近90人。党的组织辐射了整个矿区，党的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为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奠定了基础。

2. 启发工人觉悟，酝酿工人斗争

党在门头沟矿区很早就有过活动，但由于这里的工人流动性大，再加上抗战后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大量游民涌入门头沟，所以启发工人觉悟，开展工人运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地下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矿工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积极地引导。

中英门头沟煤矿（简称中英矿）地下党总支书记傅进山（化名王进）同志，经常把解放区的传单带到锅伙里，给工人们讲解，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他还经常下井，与工人一起劳动和聊天，他曾多次救济帮助矿工，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中去。矿工张平道因生活所迫，要去出卖自己的被子，被傅进山拉住，傅拿出自己刚挣来的工钱，塞到张平道的手中，使张平道和在场的工人们非常感动。不久张平道的弟弟又得了伤寒病，没钱医治，只能等死。这时傅进山又拿出自己的钱去请医生、抓药，帮助看好了病。傅进山与工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人们发自内心地说：“老王，我们听你的。”

按照工委的分工，张宏舜同志直接联系中兴矿的工作。他为了发动工人，经常深入到井下对工人进行教育，用简朴实在的语言去启发他们的觉悟。一天，张宏舜在井下和工人们干完活，准备升井，这时他看到青年工人杨宝山不升井，还要打连班，就走过去耐心地对讲起工人受剥削的原因。

张宏舜问：“你为什么打连班？”

杨宝山答：“不打连班吃不饱。”

张宏舜问：“你第一天挖多少煤？”

杨宝山答：“少说有两吨。”

张宏舜讲：“一吨煤可以换二百斤粮食，两吨煤就是四百斤，你再打一个连班就是八百斤，而你一天能得到多少呢？”

杨宝山答：“三斤粮食。”

张宏舜问：“那么多粮食哪去了呢？”

杨宝山答：“那还用说，让资本家赚去了呗。”

于是，张宏舜又慢慢地讲：“我们工人拚死拚活地干，连肚子都填不饱，而资本家不劳动却有吃有喝，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资本家的钱是我们工人的血汗，我们要起来和他们斗争，这样工人才会有出路。”听了张宏舜的这番话，杨宝山心里顿时亮堂了，他认识到，工人不是生来就命苦，而是工人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剥削了去。所以，要想吃饱，不再受穷，就应跟着共产党走，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在傅进山、张宏舜等地下党员的努力下，中英、中兴两矿的工人开始觉醒了，斗争的火焰在他们胸中熊熊燃烧起来。

二、中英门头沟煤矿工人大罢工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华北政务厅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中英门头沟煤矿。国民党政府接管后，对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由于当时门头沟的游民较多，很多人愿意到矿上上班，于是，资本家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压缩工人的工资，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们的生活急剧下降，他们不仅不能养家糊口，而且自己也是饿着肚子到井下挖煤。

中共门头沟工委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的工资，决定在中英矿举行罢工，根据

工委的指示，中英矿地下党总支制定了罢工的原则和目的。原则为：一是工友们要团结一致；二是提出的条件应符合工友们的切身利益，并经过斗争能够达到的。罢工的目的是提高工人工资，上一个班增加二斤半米。为了取得罢工的胜利，地下党负责人宋兆祥、董瑞祥深入到矿工中，积极地宣传、号召工人为增资而斗争。傅进山在井下打了几个连班，发动工人，激发大家的斗争勇气。矿工们纷纷表示“只要有人带头，我们就跟着干。”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英矿工人为增资而举行的大罢工开始了。这天，傅进山带领党员和罢工骨干，准时来到矿南大门前。矿工们也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广大矿工被发动起来了。傅进山挥动着拳头，激动地对大家说：“工友们，现在市场上的东西没有不涨的，而我们的工资一分也不涨。我们要活，要填饱肚子，资本家就得给我们涨工资，如果不涨我们就不上工。现在，我宣布罢工开始！”一呼千应，工人们要增加米，要涨工资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

起初，资本家以为这些工人是一般的闹事，大不了，他们站在大门里对工人喊：“不上班，什么钱也没有。”但眼看大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工人的口号声越来越高，资本家着急了。

矿方代理人、总管张万德，出来与工人对话，他神色紧张地说：“你们先上班，涨工资的事好商量。”工人们坚定地回答：“不涨工资，绝不上班。”张万德无奈，只好向主子去汇报。资本家看到工人比较强硬，就决定给工人们中当班的增加一斤半米。这时一些工人感到满足了，要停止罢工。傅进山和其他地下党员，鼓励工人们不能松劲，坚持要求增加二斤半米。资本家见软的不行，就拉出矿警队，企图压服工人。然而，面对真枪实弹的敌人，工人們的斗争锐气丝毫没有减弱，他们继续高喊：“我们要吃饱肚子，要增加二斤半米。”

地下党把罢工的传单贴在开往北平的煤车上，门头沟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平，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和关注，北平市长给宛平县长打电话询问情况。宛平县长又马上给门头沟六分所伪警察所长去电话，指示不宜把事情闹大。资本家束手无策了。在党的领导下，中英门头沟煤矿一千一百多名矿工参加的为增加二斤半米的罢工斗争，坚持三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是我党领导下，战后北平第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也是京西矿区工人运动史上规模较大的罢工。罢工的胜利，教育了人民，唤醒了群众，使越来越多的矿工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在中英矿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宏顺、四维、中兴等矿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其中门头沟地区第二大矿——中兴矿的罢工斗争最颇为激烈，影响颇大。

三、中兴矿工人两次大罢工

1. 第一次大罢工

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费开支猛增，财政赤字严重，由此又滥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门头沟地区一九四六年一月，粮食价格猛增，小米由一百九十元一斤涨到二百八十元一斤。白面一斤由二百元涨到五百八十元。而当时中兴矿里外工的日工资均为一千五百元，即

只能挣二至四斤粮食。这样低的工资，维持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都很困难，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年关将近，工人们政府对政府的不满，要求提高工资的情绪日益高涨。

在工人最困难的时刻，中兴矿地下党组织反复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及各种条件。决定在中兴矿举行里外工联合大罢工，要求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一月二十三日晚，张宏舜组织召开中兴矿积极分子代表会，推选了工人代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会上提出了罢工的口号。

一是我们挽留柳矿师（柳矿师因同情工人而辞职，这只是罢工的借口，目的是争取上层人物）；二是每年年节发给一个月双支，广泛宣传去年矿上赚了二百万元，不仅没给工人涨工资，还扣压工资，降低工人待遇。

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六点，中兴矿突然变成了死矿，“绞车不转了，铁匠炉的炉火熄灭了，机器房的门被上了锁，所有的机器都停了。”全矿四百多名工人统一行动，一致罢工。

矿上的总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派人去北平请示公司总经理。当天下午，公司来了三人，召集高级职员和包工柜柜头开会，研究罢工问题。讨论半天，毫无结果，准备找工人代表谈话。

当晚，地下党召集工人代表会议。从广大矿工的实际利益出发，考虑可能，并经过和代表协商，提出了复工的三项条件。

一是从一月二十日开始，工人工资由一千五百元提到二千一百元（日支）；

二是按日支二千一百元发给里工半个月的双工资；

三是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

资本家最后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

罢工两天，矿方少出煤一千五百吨，少收入五百二十五万元，里工九十五人，发罢工工资四十九点九万元，外工三百三十三人，工资由一千五百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元，共计六十六点六万元；里工增加了工资，加上半个月双支，共计三百一十三点五万元。这些项目加起来，矿方共多支出九百五十五万元，工人多收入十三万七千五百元。

罢工的胜利，使工人们欢欣鼓舞。有的打酒买菜，庆祝胜利，有的工人高兴地说：“我在中兴矿这么多年，没经过这样的事，这是到中兴矿以来最大的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中兴矿的工人发动起来了，斗争情绪空前高涨。

2. 第二次大罢工

工资提高了，但物价一日三涨，货币不断贬值，工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障。怎样才能稳定住工人的收入，进一步维护工人利益呢？张宏舜在井下召开了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再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是：一要使工人的日工资提高到能买七斤小米，二是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工人五天一开支，开支要按五天中间那天的粮食价格来计算。会上，张宏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挣的钱，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能养活家呢？最近煤价提了很多，资本家又赚了不少，我们不能听任资本家的剥削，要团结起来，去和资本家算账。”张宏舜的话，鼓舞了工人坚决罢工的斗志。

为了更广泛的发动工人罢工，党组织分别派出党员到工人中去串联，有的包工柜没有党员，党组织就派专人去做那里的工作。在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周密布置下，中兴矿第二次大罢工开始了。

二月十三日，中兴矿的水泵突然停了。绞车轮子上，不知被谁贴了封条。工人们不来上班，中兴矿陷入了瘫痪。矿上经理看到工人又“闹事”，不能出煤，马上进城去找资本家。

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选出了杨宝山、徐德福、郭福群、崔尚元为代表，去和资本家谈判。资本家对代表们威胁地说：“你们要能让工人复工，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但经过斗争考验的工人代表们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坚定地说：“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煤炭价格继续上涨，但矿上已无煤可卖，眼看获取大量利润的时机就要丧失。资本家无奈，只得答应了工人罢工的要求。中兴矿三百多名里外工参加的、坚持两天的罢工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中英、中兴两矿三次罢工斗争，在门头沟矿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矿相继掀起了罢工风潮，四五年底至四六年春，罢工总数达十三次之多。煤矿工人的斗争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唤起了广大矿工坚定跟党走，敢于斗争的勇气，为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赢得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初期，门头沟矿区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北京矿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注〉：本文引用的数字，均来自市桂B2——167《门头沟工委四个月来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的火村模范队

何 建 忠

抗日战争时期，平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斋堂地区，有一个具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村庄——火村。这个村子距斋堂五华里左右，由于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广大人民群众很早就具有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早在一九三六年时，这个村子的群众就在具有正义感的青年李万玉、李全善的号召下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反霸联盟，与地主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反对赌博，提倡禁烟，减地租，抗杂税。”等一系列革命的口号，从而形成了一股自发的革命力量，为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京西大地。也波及到了这个僻处深山的村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使火村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快地组织起来，原“反霸联盟”组织的主要成员成了火村各抗日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李万玉担任了抗日救国会主任；韩贵担任了抗日自卫军队长；李全善担任了指导员；李万波担任了农会主任；刘淑珍担任了妇女联合会主任；李万丰任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

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火村第一个党支部。李万玉任支部书记，李万法、李万瑞为支部委员，并发展了八名共产党员。从此，火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艰苦的对敌斗争。火村模范队的抗日战争活动更是如火如荼，至今有些老人提起火村模范队来无不交口称赞。

一九三八年冬，我昌宛县委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更好地打击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决定在马栏、火村等几个革命基础较好的村子成立模范队（民兵中的骨干），直属县委领导，其任务是保卫县区党、政机关，骚扰敌人，惩治汉奸、特务。根据县里的指示，火村党支部从全村自卫军中挑出三十余名精明强悍的人组成模范队，由李有明任模范队队长，共产党员李万法任指导员。下分三个班，由李万丰、张成儒、白晓楼分别任三个班的班长。县里发给模范队二十余条杂牌步枪，有水连珠、湖北造、单打一等，有几支还不能用，只不过是样子。为了弥补武器的不足，几个模范队队员用自己的钱从抗日联军战士中（抗日联军路过斋堂地区时，不少战士有自己的私枪）买了五支盒子枪，六把撸子枪和部分子弹，又通过亲朋关系弄到两把撅把子枪，这样，每个模范队员都配备了枪支。队员们又自己缝制了子弹袋、手榴弹袋、干粮袋等，基本上全都装备起来。这样，一支抗日的武装“火村抗日模范队”诞生了。

模范队成立之后，根据县委的指示，经常外出执行任务，家中的农活就顾不上了。火村党支部为了保障模范队的行动，使队员在外面安心地开展对敌斗争，就组织了代耕互助活动，凡是模范队员在外执行任务期间，他们地里的活由支部组织群众去代耕、代锄、代收，从而保证了模范队的战斗力。模范队在外活动期间，吃军粮、发军鞋、发日用品，一切行

动听从县里安排，随叫随到，不得有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模范队曾派出二十余人到黄岭西配合县大队驻防，任务是防止怀涑汉奸董久杰部骚扰我根据地。驻防期间，模范队抓到一个汉奸队的探子，经审问了解了敌人活动部署后，将其押送到县政府，为整个部队的行动部署提供了可靠的情况。后来，模范队又到元港（大安山地区）、青白口等几个村子配合正规军作战，为正规军当向导、站岗放哨、递送情报，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鬼子到平西革命根据地斋堂地区进行扫荡，驻在西胡林村，准备第二天上午从西胡林出发，经火村进攻马栏的八路军司令部驻地，县里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命令火村模范队骚扰敌人，阻止鬼子进攻马栏。模范队接到这个任务后，根据县里的意图，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第二天天未亮，模范队在队长李有明，指导员李万法的带领下，迅速占领了火村东坡尖山头阵地，并构筑了工事。在正规部队回家探亲的杨小豹（军响人）正在火村舅舅（李万清）家住着，得知此情况也积极地参加了模范队的行动。模范队员们严阵以待，注视着西胡林方向敌人的动静。到上午八、九点钟，敌人大约有一百多人从西胡林大平台上下来，直奔火村。杨小豹不愧在正规部队受过训练，又使的是自己所带的“三大”大盖枪，距鬼子还有好几百米，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鬼子打倒了，其他的敌人马上停了下来，就地卧倒，观察情况。开始也弄不清是枪从哪里打来的，待弄清楚后，机枪、步枪一起朝模范队隐蔽的东坡尖阵地打来。模范队人员少，武器都比较差，有的枪打一发子弹，子弹壳退不下来，还得用鞋底子使劲拍打。为了拖住敌人，想办法迷惑敌人，杨小豹用一根棍子顶着军帽来回晃动，造成有很多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的假象。模范队队员们也分成三、四个人一组，集中开火，轮流射击，打几枪换个地方，使敌人也不知有多少八路军，不敢贸然前进。这样，一直僵持到下午，敌人觉察到我们不是八路军正规部队，就缓缓地往前移动。敌人越来越近，模范队的子弹打得没有多少了，估计马栏八路军那边也作好了准备，就一阵排枪过后，趁敌人卧倒之际，迅速撤退到东张家坨（西岭），班长李万丰带着一个班直奔马栏向八路军汇报情况去了。这时鬼子看到我方打了一阵枪后没了动静，就冲进了村子，村中的老百姓也早已躲到山里躲了起来，连个人影也没见着，他们自己反而死伤好几个人，于是气急败坏，放火烧房子。全村除了几处用石头砌的房子没有烧毁外，其余的都烧着了，总共烧毁房屋四百四十多间。敌人的暴行，不但没有吓住火村的群众，相反，更加激起了模范队员及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的决心。

一九四〇年冬天，原来模范队的部分队员参加了八路军，模范队由李万丰任队长，李万瑞任指导员。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由于环境残酷，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化整为零，把模范队改为游击组，坚持对敌斗争。他们除配合部队执行任务外，还打击汉奸特务，除掉敌人的耳目，保证我县、区、村干部开展工作。有一次，游击队与马栏的游击组驻防煤窝时，经过侦察，距煤窝十多华里的千军台村的汉奸刘天定经常与板桥、大台据点的敌人勾结，探听我八路军、县、区、村干部的情况，于是决定去抓他，派火村李万丰、马栏的杜春耕二人共同执行此项任务。这俩人谁也没见过刘天定这个人，怎么去抓呢？先化装成背煤工人，向群众打听刘天定的相貌，有人告诉他们说，刘天定是个大高个子，经常穿一身青布衣裤，密排扣子。二人心中有底了。这天，李万丰、杜春耕了解到刘天定在千军台村里，就立刻出发了。千军台村，当他们来到千军台街时，正碰上刘天定迎面走来，二人紧步迎上去，突然发问：“你

是刘天定吗？”刘回答：“是，你们要干什么？”李、杜二人迅速拔出手枪对准他说：“我们是八路军，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刘没有带枪，看样子不走也不行，只好从命。李、杜二人把刘天定押到煤窝，又从煤窝送到县政府。到县政府后，刘假意招认了自己以往的罪行，获得了宽大处理，押了些日子就把他放了。但刘天定出来后，恶习不改，照旧给日本鬼子干事，最后被人民政府抓住枪毙了。

曾参加过八路军的张巨珍，当了可耻的叛徒，此人对火村的干部比较熟悉，就劝火村村干部投降敌人，火村干部早就了解张的情况，但为了摸清其来意，更好地打击敌人，他们强压着心中怒火，经过谈话，也假意答应了张的劝降，并约定好时间，叫张巨珍带敌人来谈判。张走后，火村党支部马上组织游击小组和民兵作好伏击敌人的战斗准备。但是，几天过去了，张没带敌人来，他自己来到火村，正碰上李万举，万举把张迎到自己家中，让他先吃饭，稳住了他，然后借机报告了村干部，派李万瑞带几个队员和民兵一道，迅速赶到李万举家，将不知所措的张巨珍捆了个结实。然后，把他弄到白虎头村的白墙子，将他处死。除掉了一个民族的败类。

火村人民的抗日斗争活动，引起了敌人的仇恨，他们利用汉奸探听情况，千方百计地想抓捕火村的干部、党员和模范队员。汉奸李丰集是火村人，全家人都当汉奸。一九四一年夏锄季节，李丰集的老婆跑到日军据点报告，说模范队队长李万丰的父亲在修路工地。日本抓不到模范队，就把仇恨集中到他们家属身上，当即把李万丰的父亲李景斌抓去给活活打死了。当天晚上，敌人又到火村抓人，因村干部早有准备，一个也没抓着。李万丰同志把这个杀父之仇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到了这年的冬季，一天，李丰集的儿子李万文来火村探听情况，李万丰知道这一情况后，杀父之仇焉能不报，再说汉奸不除，对革命工作也不利，于是他招呼李有度一起去抓李万文。此时，李万文办完事刚到村口，万丰、有度追上了他，李万文还假装客气地说：“是你们二位呀，好久不见还挺想的呢。”企图以此来迷惑二人。李万丰马上接过话茬说：“是啊，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吧”。李万文觉得情况不妙，也清楚此去恐怕性命难逃，还想要花招。赶忙说：“我给你们钱。”李万丰说“今天不要你的钱，而是要你的命”。说完，万丰、有度上去抓住李万文就往村中走，一边走一边用手榴弹砸他的脑袋。当走到村长门口时，李万丰从村长家门后抄出一把斧子，上去一斧砍在了李万文的脑袋上，除掉了火村一大祸害。万丰、有度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还奖给他们五十元钱。

大安山地区莲花庵村有一个汉奸叫任××，此人勾结日伪干了不少坏事，我抗日政府曾几次派人抓他，因其作贼心虚，特别狡猾，几次都被他溜掉了。一九四一年的一天，二区治安员于振边到火村来，说已侦察到任××的下落，请模范队派几个人去共同抓他。模范队派出李万丰、李万相、李万杜、李有度、梁士达、张诚儒等七个人与于振边一起去。他们来到西苑村后，已侦察好任××在这村参加一个婚礼，为不打扰人家的喜事，准备等任××出来后抓他。于振边部署了除奸人员，李万丰、李有度在任××出来后必经的路边埋伏好，其他人等在办婚事的这家门外，警戒准备在村口来个前堵后截。一切准备就绪，专等汉奸露面了。时间不长，就见任××从门里出来了，因于振边在此地大多数人都认得他，除奸反特出了名。所以，这个汉奸一出门就看见了于振边，知道事情不好，沿地边就跑。于振边等撒腿就追，等汉奸跑到李万丰、李有度二人跟前时，二人早已迫不及待地地上去就将其扭住，汉奸

束手就擒，从他身上搜出一颗手榴弹，然后几个人将其扭押到一个山沟里，让他跪下，张诚儒上去就是一枪，没打死，李万相又照准他的脑袋开了一枪，将其击毙，几个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模范队不仅积极地配合了部队的行动，除奸反特，还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劫持敌人的物资，以解决我军需民用。他们还破坏交通，使敌人运输受阻。割电话线，使敌人通讯失灵。如一九四一年秋的一天，模范队打听到日本驻斋堂的合作社，要从门头沟运一批盐给山里日军各据点。当时，我根据地的物资非常缺乏，如果把这批食盐缴获，可解决我根据地部分军民的吃盐问题。经过侦察，情况属实，李万丰带领部分队员赶到运盐队必经之处——七里坟（在由军响去煤窝的路上），正赶上有十几把儿牲口队过来。一看，怎么这么多呀，拦住后一问，原来狡猾的敌人让他们运盐队与老百姓的运盐队混在一起走，也不派押运的人员，一眼看去，就好像都是老百姓的牲口队，八路军就不截了。李万丰让全体掌鞭的（赶牲口的）拿出证明来，不然就不让走。这样一来，就有大部分人赶紧出示了八路军开的路条、证明，显然这些人是老百姓或当地作买卖的人。而剩下的有四把儿牲口驮子，再一审问，就都是日本据点合作社的了，共有三千来斤食盐，模范队就把这批盐全都送到我县政府驻地通州峪，受到了县政府的表扬，解决了我根据地部分军民吃盐的大问题。

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修沿河城的公路，日本工头宫种对待修路的民工特别狠，经常打骂民工，火村的模范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把宫种收拾了。一天，李万丰、李万瑞等几个队员趁着夜色摸到宫种在沿河城的住处，出其不意地将其抓获。但是，因行动匆忙未带绳子，也就没有捆他，只押着他往回走，走到一个斜坡的地方，宫种突然跌倒顺山坡滚了下去，待队员们反映过来，宫种已跑出一段距离，因距敌人据点较近，也不能开枪，追了一段，天黑林密，让宫种跑了。几个人一合计，虽然宫种跑了，但也不能白来，他们又迅速摸到仓库所在地，经过仔细观察，见守仓库的敌人没在，就赶紧撬开库房的门，弄出四箱炸药，四盒雷管，还有一大卷导火线，他们直接把这些东西送到县政府。

火村模范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鬼子不得安宁，让汉奸、特务胆战心惊，对模范队恨之入骨，他们曾几次进行围剿，只抓到一个模范队员李景有。鬼子把李景有带到据点，绑在地雷上炸死了。模范队员李万槐在二区帮助工作期间，在大安山的中山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与于振边等几个人光荣牺牲。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们，特为牺牲的烈士立了纪念碑，李万槐的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他与众多的革命烈士一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火村的模范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断地打击敌人，锻炼自己，并积极地为我八路军输送了兵员，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火村参加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就有4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我正规部队的建设，火村人民的模范队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年的模范队员李万丰、李万法、李万相等提起当年的战斗生活，无不感到自豪。

〈注〉：此文稿根据李万法、李万丰、李万江、李万相等老模范队员回忆整理。



齐家庄村除奸小组的活动

李文炜

抗日战争期间，齐家庄村建立了一个除奸小组，他们在除奸反特的活动中，为抗日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建除奸。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经过几次对平西根据地大扫荡，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在昌宛联合县杜家庄建立了据点，配合斋堂川的日军据点对点周围的村庄进行清剿、封锁，实行“三光政策”，推行“强化治安”，妄图扑灭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

在军事上暂时处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了暂避敌之锋芒，保存实力，不得不暂时退到大后方的山区坚持斗争，与敌占区的人民和抗日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日军对占领区的人民的统治十分残暴疯狂。面对日寇铁蹄的践踏和蹂躏，群众是多么盼望共产党和抗日政府派人来给他们解除危难，指出抗战斗争的道路哇！

就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年轻的李春元悄悄地约了同村的谭巨斋，跋山涉水，踏着深山小路，去找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在现黄塔乡南沟的一个小山村“简昌”找到了当时的三区区长谭怀民，区委书记史广通及区治安员索广宽同志。亲人见面，分外热情，李春元首先向区领导汇报了杜家庄据点内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和西沟各村群众的情绪。然后谈到敌人封锁时说：“村中的抗日干部和群众，不能随便出村，区、县干部也不能贸然地进村，只要一去，敌人就发觉，就派人去抓。”最后问起今后该怎么办时，三位区领导首先向他二人讲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内容，并说，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发动群众，坚持持久战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二人听后，连连点头。最后索广宽同志又着重讲了加强除奸工作的重要性。他说：“除奸工作做好了，就是割了敌人的耳朵，挖了敌人的眼睛，敌人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了。除奸工作要做不好，其它工作都无法进行。你们回去要马上组织除奸小组，加强除奸工作。”

李春元和谭巨斋回村后，找到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春方同志，汇报了区委指示，经过商量，决定成立除奸小组，由李春元担任组长，秘密发展除奸组员，要单线领导。当时党组织尚不公开，除奸小组也不例外。除奸小组组员中有党员也有群众，条件是“热心抗日，忠实可靠”。除奸小组成立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问题，抗日干部到齐家庄村来，都由除奸小组夜里从村东头秘密接进去。开始觉得很严密，可是干部一去，敌人岗楼就知道，大家都感到很奇怪。难道村中有日本的奸细？这奸细是谁呢？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李春元就布置给除奸组员张廷都，叫他查清这个问题。张廷都接受任务后，就每天早晨起来，背上粪筐假装拾粪，在村外的道上注意观察。不久，发现齐家庄村的刘增茂也是每天早上顺着大道往下捡粪，一直捡到“背子口（地名）”。同时还发现张家庄王景茂也到“背子口”，感到可

疑，张廷都越来越往前挪蹭，刘、王二人来的早，张廷都比他们还早，躲在僻静处细心观察，注意他们二人见面后究竟干什么。很快就发现这二人到背子口河边的一个堤中（庄稼人用石头砌在河边的，将河水斜着引向对岸，以保护自己河边的土地不被河水冲毁用的），往堤中石头下放东西。刘增茂拿来的纸条放在那儿，王景茂拿来的也放那儿。张廷都明白了，他们是在交换情报！又经过几天的调查核实，弄清情况后，报告到区里。

一九四二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三区派游击队长连维江带领游击队，夜间到齐家庄村，把奸特刘增茂抓走，用刺刀把他捅死在下村头的河槽里。随后又到张家庄，将王景茂抓住，枪毙在背子沟里的杨树林内。后来又杀了双塘涧村的杨万恒和杜家庄的老牌特务曹殿臣，这样一来，坏人被镇住了。以后在这条西沟里，敌人据点就真的耳聋眼瞎了。

经过党对李春元同志的一段考验后，区委派王增培同志到齐家庄来给李春元填了入党申请书，几天后经区委批准就入了党，并参加了齐家庄村党支部委员会，担任了武装保卫委员和村的武委会主任兼治安员。

二、除掉汉奸王俊英。日军在清水建立据点后，王俊英就当上了日伪清水乡大乡长，成为清水一带北沟、西沟、南沟的汉奸头子。一九四三年春，区里了解到王俊英要到杜家庄去，就派李春元和刘增田二人到塔河口去等他，待机将他抓捕。二人接受命令后，李春元带上区干部刘增斌的一支撸子枪、两发子弹，刘增田拿上区治安员谭厚进的一支撅把子，三发子弹。他们先到张家庄傅忠书家，找了个破篓子，用梢子绳拴了个袷，背上就下去了。穿过杜家庄，来到塔河口，见地里有小孩在收拾地，他们俩就用帮小孩干活做掩护。一个多小时后，见王俊英下来了，前后有四个扛着步枪的乡丁护卫着。二人合计，他们人多武器又好，自己的枪不行，子弹又少，还不知能不能打响，就未敢轻举妄动。等王俊英一伙人过去，二人就返回了齐家庄。吃了点饭，找到区游击队长赵永成，把经过一说，赵永成说：“行啦，咱们晚上到上清水他家去掏他”。

夜幕降临，赵永成同志集合游击队，沿着山间小路，悄悄地来到上清水村，先观察了一下清水据点内敌人的动静后，就来到了王俊英家墙外，翻墙跳入院中，只见屋内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游击队员贴到王俊英的窗户下，舔破窗纸，向里一看，见王俊英坐在上首，几个人正围坐在八仙桌边打麻将牌。此刻，只见王俊英摸起一张“八万”，翻过来一看，高兴地喊道：“和啦，满贯！”这时，赵永成抬起右脚，咣当一下，踹开房门，进屋后对王俊英说：“你满贯啦，好！”同时进去几个队员，七手八脚把王俊英捆了起来，其他人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赵永成对他们说：“大家别害怕，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找王俊英来算帐的，没有你们的事，但是，你们谁也不要离开此地，谁要动就不客气”。这些人哆哆嗦嗦地连声说：“我们不走，我们不走。”赵永成带上人出屋后，回手将门锁上，押着王俊英走到田寺口，命令队员将他枪毙了，又为本地区除了一个大害。

三、给十一分区买盐。一九四三年清明上坟的季节，一天早上，齐家庄村村长谭怀德去找李春元说：“哎，有个事，区委拿来一百二十块钱，是十一军分区司令部的，让你把这钱送到杜家庄，交给杨殿璧，叫他给买盐。”当时由于日军的封锁，部队和根据地的人民都吃不到咸盐，就是在敌统治区内，也是按人头配给食盐，而且数量也很少。因此，吃盐必须到敌占区去搞。李春元接到任务后，拿上钱就上杜家庄据点找杨殿璧去了。一进院，见杨殿璧在

屋内脸朝墙坐着呢，他一听到脚步声，经过一扭脸，李春元赶到近前说：“四哥”！话音未落，只见杨殿璧脸一绷，眼一瞪问：“你干什么来了？”“有点事”。李春元回答。他见杨的气色不对，忙用眼光向四下里一扫，只见屋里地上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把茶壶，便三步两步蹿到屋里头去了。杨问：“你为什么不出工？”李反问说：“我怎么不出工啊？”杨说：“你出工是替八路军出工”。李春元这时把钱掏出来，“啪”地往桌上一摔，语气坚决而又带有命令的口吻慢慢地说：“不光我给八路军出工，你也得给八路军出工。这是十一分区拿来的一百二十块钱，叫你去给买咸盐，这有条子你看看吧。我的任务完成了”。说完用手按住了大茶壶，准备杨殿璧下手动武时好用来砸他。杨殿璧听了李春元的话，暗暗吃了一惊，心中琢磨：给买吧，日本人知道了就得掉脑袋，不给买，又怕十一分区饶不过自己，左右为难。又思考片刻后，改用缓和的语气对李春元说：“你把钱拿回去一半，给我留一半”。“我的任务是给你送钱，把钱交给你，你一块不留在你，我是一块也不往回拿。”李春元寸步不让地说。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工作班的特务“鬼子六”来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杨殿璧一见赶忙把桌上的钱搁在坐的毡子下面。“鬼子六”进屋一见李春元就问：“你哪的？”李春元说：“齐家庄的”，杨殿璧接过来问：“这是我弟弟，看我来了”。“鬼子六”“噢”了一声，“你弟弟看你来了”。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李春元一阵说：“好，你们哥俩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走了”。杨殿璧送“鬼子六”出了大门回来，又和李春元商量：“这钱你还是拿回去。”李春元口气更坚决而强硬地说：“咱们也别废话，一分钱我也不往回拿。”他思虑任务已经完成，此地不能久留，随即对杨殿璧说：“我怎么办？”杨说：“你走呗。”李问：“我怎么走？”杨说：“我给你出门证。”李说：“你把我送出去。”杨说：“行喽，我送你。”于是两人起身，出了杜家庄，走过了河神庙，杨殿璧回杜家庄据点了。李春元一口气跑到齐家庄的坡根子，回头一看没人来追，心中这才踏实。之后，杨殿璧把盐分批买好，暗暗地托人送到齐家庄，转交给十一分区，暂时解决了部队吃盐的困难。

四、巧杀日特周邦彦。一九四三年秋，正是割谷子的时候，一天，三区的区委书记吕连英同志到齐家庄村去，对李春元说：“给你个任务”。李问：“什么任务？”吕说：“你把杜家庄据点内新来的那个日本特务周邦彦想办法抓出来弄死，因为他打民伕打得很厉害，太坏”。李春元同志当时正发疟疾，每天犯一次病，但想到为民除害，就不顾个人的病痛和安危，毅然决然地说道：“好，交给我吧”。接受任务后，李春元找到同他最要好的刘增田同志，约他同去。二人研究好了办法，做好了准备，带上一支撅把子，两颗手榴弹，一条绳子，手里拿把镰刀，装做下地干活的样子，就到杜家庄据点栅栏门外面约百米处等待周邦彦出来。

入秋季节，村边地头树上的枣熟得红红的，吃到嘴里真是又脆又甜，解饿又解渴。李春元他们二人整天在那儿执行任务，有时肚子饿得咕咕响，也没摘过人家一个枣吃。那时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有严格的纪律，就是到敌占区去也不能糟蹋老百姓的东西，否则就是违反群众纪律。因此，肚子再饿，也得忍着，自觉地遵守纪律。

转瞬之间，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只见岗楼下有两个日本兵在给战马钉马掌，一个抱马路的，一个打锤的，打出的火星闪闪发光，看得清清楚楚。两人正在留神观察，就见周邦彦由岗楼里出来啦。李春元在地堰下墙根里走，刘增田在地堰上边走，周邦彦见刘增田穿

一件破夹袄，底襟在腰带上掖着，脚上是两只“飞机鞋”，一走一趿拉，行迹可疑，就扒了块石头要打他，刘增田说：“太君，我是苦力的干活”。刘增田趁周邦彦撂石头的一刹那，一个箭步窜上去，抱住了周邦彦并把他撂倒按在地上。李春元从地下堰跳上去，用左脚一蹬周的脖子，掏出绳子把他捆上。回头一望，岗楼底下那两个日本兵还在继续给战马钉掌哪，没有发现他们的行动。刘、李二人弯着腰在地上拉着周邦彦穿谷子地走出三十多米，来到一个小山头处，下去是一条小沟，就拐了进去，等岗楼上的敌人看不见了。才把周提了起来，叫他站着走。他不走，想喊又喊不出来，因为周邦彦在打仗时，被子弹打掉了喉头，用一个纺线的轴堵在喉头处，再用纱布缠上，每当说话时，得先用手捂着喉头处才能说出话来。现在捆着双手，所以喊不出声音来，急得他直喷白沫，就是不走。后来李春元解下皮带狠狠地打了他两下，打疼了他，这才跟着走，等把周邦彦押到了齐家庄上村头时就用撅把子把他崩在那了。

五、捕捉恶霸汉奸王三羊。王三羊，又名王俊德，绰号“上山虎”。是老宛平县八区上清水村的一霸，一九三七年前，任国民党清水乡的大乡长，曾仗势逼死村民连长庚的母亲，连长庚上告到国民党宛平县法院，王买通了法院，反将连长庚关押了六个月。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王三羊在村中抓了一批民伕，抢了些骡马牲畜，交给国民党带走，有的一直下落不明。当时村民王建风向他索要骡款时，王三羊不但不给，反而开枪将王建风打伤。日军在清水建立据点后，王三羊又投靠日寇充当了汉奸，依仗日本人的势力，更是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纷纷向抗日政府控告他的罪行，房宛昌联合县政府通知三区，将王三羊抓住送到县公安科处理。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夜里，区游击队长赵永成带领李春元、杨殿兴和游击队员到达上清水村外，听到据点内的日本兵和伪军们在过中秋节，这儿也喊，那儿也叫，乱哄哄直到深夜才静了下来。游击队悄悄地进了村，摸到王三羊家，将王三羊抓住押出村，那时已是次日拂晓时分了。游击队押着王三羊从清水向北绕木兰台山到双塘涧的苇子地，找了两个民兵，让他们把王三羊押解到县公安科去。两个民兵领命后，押解王三羊绕过双塘涧到达小龙门口时，王三羊哀求给他松松绳子，两个民兵的心一软，就给他松了松。过了天河水，又给他松了松。等爬过了岭南台那个鞍，王三羊突然挣脱了绳子，转身夺过了民兵手中的步枪说：“你们俩一路上对我还不错，我不打你们”。随后卸下了枪栓拿跑了。王三羊这一跑可坏了，他直接奔了门头沟的敌占区，投到日伪警备队当上了中队长。日军投降后，他又加入了地主反动武装——宛平县还乡团第九大队，当了中队长，不断带队还乡，讨伐解放区，杀人放火，继续作恶，直到解放后，才又重新将他抓捕归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后，判处了死刑。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终将王三羊枪毙在王平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六、“实在人”的美称。抗战爆发后，李春元同志已是一位血气方刚、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他中等身材，魁梧健壮，黑脸膛、浓眉阔目，性情直爽，不但机智勇敢，而且胆量过人，日军在斋堂川建立据点后，他目睹了侵略者的血腥罪行，义愤填膺，决心找到共产党，投身到抗日斗争的烈火中。当他找到党后，对党交给的任务，一丝不苟，从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由于他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胆忠心，上级党组织对他也十分信任。一次，区委书记吕连英派他给县委书记杜存训同志送一份文件，临走嘱咐他，这是党的机密文

件，要直接交给老杜同志，见不到老杜同志任何人不要给。李春元接到任务后，跋山涉水，绕过敌人的道道封锁，昼夜兼程，终于在一个偏僻小村里找到了县委机关。一进门，秘书问：“你送文件来啦”？李春元说：“啊”。“给我吧”。“这不能给你”。“你给谁”。“给老杜，”秘书听后笑着说：“他在里头呢。去吧”！李春元迈步进了屋，见老杜正在看书，上前便说：“老杜同志，我给你送文件来了。”说着将文件递了过去。“给我写个收条吧。”杜存训同志热情地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碗水说：“喝吧”。等李春元喝完了水，老杜说：“交给他（指秘书）吧。”李春元说：“那可不行。老吕栽培我，叫我交给你”。老杜说：“交给他没事，他登记了再给我。你真是个实在人呀。”李春元说：“那可不，叫我给谁，我就给谁，不见本人不交”。这以后，“实在人”的美称，就在房宛昌抗日根据地内传开啦。





柏峪村儿童团活动片断

谭 云

我自幼就是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成长的，现虽年过花甲，但我对抗战时期儿童团的革命活动永志难忘。因为它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着关键作用。为此，作一回忆写成此文，供青少年借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妄图侵占中国大地，于一九四零年在我的家乡斋堂、清水一带修炮楼设据点，使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的各项活动由高潮转入低潮，由原来的抗日根据地一下变成了游击区，有的村成了日寇盘据的敌占区，各项抗日工作十分艰苦。

平西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工农红军第六支队和改编后的第五支队（后改为八路军）先后来到斋堂一带，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在此建立了宛平县抗日政府，并建立了所属下的抗日区公所。各村先后建立了党领导的农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模范队（现在的民兵组织）和中、老年参加的自卫军等各个抗日群众组织。在青年救国会少先部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儿童也组织起来加入抗日队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掀起了全民抗战的高潮，儿童团边学习边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抗战时期做出很大贡献。

一、抗日救国的小宣传队：

（1）利用多种形式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大唱抗日救亡和参军参战的抗日救国歌曲。在学校唱，组织小分队唱，边唱边宣传誓死不当亡国奴，宣讲“什么是帝国主义”等。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歌声和打败日本救中国的讲演声。在召开群众大会时，儿童团提前到会充当大唱抗日歌曲的先锋队和会场上的啦啦队，活跃会场、增加会场的政治气氛。各群众团体轮番集体唱，互相之间挑战应战。以比赛的形式我唱一歌后，对方必须唱一个，对点将后不唱的，用“炮轰”，直到唱后为止。在唱歌当中，大家按指挥的口令统一集中高喊“加油”。刚唱完一首歌曲后，马上齐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会场上一片抗日歌声，造成浓厚的抗日气氛。

（2）到街头宣传抗日形势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主要形式采取讲演或问答式。记得在宣讲员提出什么是帝国主义时，大家集体答：“对内压迫，对外侵略”。这种通俗易懂的宣传深受群众欢迎。宣讲后，又大唱抗日救国歌曲，大唱“好儿要当兵”，“好铁要捻钉”、“父母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等歌，宣传动员好男儿要上前线。还定期在大街小巷内设墙报，在人口集中，交通方便的地方刷写标语，更换墙报内容，宣传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日本特务和走狗等，使农村的顽固势力不敢公开反对抗日救亡活动。

（3）积极参加农村扫盲。由于旧社会的压迫绝大多数人不识字，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受

害更深。为了使广大妇女能够更好地参加革命工作，儿童团担负起了扫盲任务，每个团员都是妇女识字班的小先生。有的轮流到妇女识字班去上课，有的经常去各家对家务重不能集中上课的中、青年妇女送生字（有统一的识字课本），还进行考试。除有组织的、分片划小组包识字外，每个儿童团员还担负着自己家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小先生的任务。到处是一片学习识字的景象，儿子教妈妈，孙子教奶奶。每个家庭的墙壁上生字满墙。识字课本的内容也是为当时工作服务的。如：“来来来，来背枪，背了枪去打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人做工，农民种田”等，既是扫除文盲，又是动员全民抗战的政治宣传。通过识字活动，使不少妇女由文盲到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积极地参加抗日的各项工作。有很多妇女干部就是从家庭中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的，通过参政、参战，不少人成了党政领导骨干。如王家山村的王文通大姐，上清水村的王甫金大姐已成为地委级妇女干部，在战争年代还有很多的妇女干部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以打霸王鞭的形式宣传群众。这是当时儿童团普遍运用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宣传文艺形式和娱乐活动，简便易行，边打边唱，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如“八路军、老百姓，咱们都是一家人，齐心合力打日本”等宣传歌曲，同时，还有宣传抗日模范人物的内容，像拥军模范戎冠秀，宁死不投降的刘胡兰，民兵爆炸英雄李永和，小英雄王二小等。每逢各种节日，如纪念“七七”芦沟桥事变，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和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庆祝纪念活动的大会上，儿童团都要先打几套霸王鞭活跃会场气氛。

（5）带头学扭秧歌舞。这是由延安根据地传播过来的，老少皆宜，带有民族风格，最受群众欢迎。扭秧歌舞时，随着鼓点音响，边扭边作宣传。这项活动当时在解放区开展的很普遍，尤其是每个节日或庆祝活动时，所有到会者集体扭大秧歌舞，场面特别壮观。还有各村的儿童团在学校老师的支持下，自编自演活报剧、双簧、抗日的文艺节目。在儿童节时还举行各村儿童团军事检阅，并选出名次以资鼓励。

二、抗日救国的小保卫队

（1）站岗放哨查路条。为了不让日本特务、汉奸走狗等混入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采取来往行人必须持过路路条的办法。各村群众之间来往都要持本村治安员核发的路条，路条上有去向和范围，有限期并盖有公章，每个路条只能使用一次。各党政军的工作人员，也同样由本单位发通行证，没有的一概不准通行，更不准进村。因当时农村大部成年人很少识字或不识字，再加上他们都另有任务，所以，查路条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了儿童团的肩上。儿童团的团员们在查路条中坚持原则，公事公办，得到领导的好评，柏峪村的儿童团还被区里评为模范。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柏峪村的深山沟里成了区公所的所在地，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曾在这里驻过一个时期。有一次宛平二区区长傅万睦同志到柏峪村查哨，假冒普通村民不带路条，他由李家庄村（区公所）路过柏峪村要到川底下村去，被柏峪村站岗的儿童团员拦住要检查路条，经再三解释后仍不准通过，傅万睦同志就说“我是区长，这次没带路条，以后再给补上”，儿童团员们不客气地说：“不带路条不准通过是你区长规定的”仍不准通过。儿童团员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了区长的表扬，并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小孩子办事认真”。

(2) 监视坏人，防止敌人搞破坏。从一九四〇年起，由于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的悬殊，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敌特和顽固势力混在一起破坏我抗日工作。为了打击敌特分子，粉碎敌人的破坏活动，在村治安员的领导下，由少数胆大心细的儿童团员配合游击队和村治安员组成了锄奸小组。经常对亲日派、顽固派和行迹可疑的人进行监督，看他们的个人活动和对外交往中有什么疑点，然后向治安员报告。如顾村妇教会干部石××与日本据点指导班打得火热，一天的晚上，石××被区游击队抓去处决了。遵照上级的指示，儿童团给日伪自卫团长陈××送过“劝告信”以瓦解敌人。日寇在柏峪村建立据点共四个月的时间，因经常受我游击队的不断袭击，加上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活动，最后不得不撤回斋堂据点去了。

不管是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各家来客必须向村治安员处进行登记，来客有什么事、住几天、是什么关系等都要登记清楚。如果有的家来客后不报告，由锄奸小组的儿童团以分片到户监督的方法及时向村治安员反映，由村治安员根据情况负责处理。在群众中听到不利于抗日救亡的话和事，也主动向治安员、村农会、村青教会及时汇报，为革命政权通风报信，防止敌人的破坏捣乱做了大量工作。

(3) 拥军优属，巩固后方。儿童团经常分头到军属、烈属、干部家属中去扫院子、抬水、推碾子磨面。对有特殊困难的军烈干属户还帮助拣柴禾、往地里送粪整地、拔草等。每逢各种节日，全体出动为军烈干属家干活，使军队安心打胜仗，使干部安心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后方。

三、抗日救国的小交通队

根据地的文信往来，设有专门邮差，主要靠沿村民兵或交通员实行各村接力的办法转送。一九四〇年日寇在斋堂一带建据点后，有的村成了敌占区，修筑了炮楼，驻扎着日军及日本特务指导班。大部分村子成了游击区，既有抗日政权，又有敌人的维持会，这些维持会经我党的艰苦工作多数由抗日政权掌握，他们对敌人采取“应付”的做法，给敌人送的情报大部分是由抗日政权定的内容，以此麻痹敌人。

当时支援前线的任务很多，抬担架、运送公粮、做军鞋、运送军需品等。在农村的中青年白天搞生产，夜间组织青抗队、模范队到敌占区埋地雷、割电话线、破坏交通，任务比较繁重。在此情况下，儿童团组织起来配合村自卫军传递信件已是理所当然的工作了。当时各村的自卫军都有专人值班，负责管理、接收和发送信件，敌较远地区和夜间外，其它时间大都由儿童团轮流传送。儿童团作为交通员的特点是传得快、认真，说交给谁的信件，不见本人不撒手，信送到后要开收条。

当时根据地的信件分“特急”、“特快”、“普通”几种，必须按信皮上注明的要求送度沿村转送。

特急的信：文件封面上有昼夜不停、风雨无阻字样或插有鸡毛或加一至三根火柴棍。

特快的信：文件封面上插有鸡毛或火柴棍。

快信：在信文的封面上有“快、快、快三个字。

在传递情报中，如果是特急信件，要跑步送到，这些信件的内容不是鬼子讨伐，就是鬼子增兵，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尽快地处理，否则就会贻误战机，甚至给革命工作带来损